

· 民国研究 ·

增上寺的香堂

——1933年东北青帮代表团的访日之行

孙 江

(静岡文化艺术大学, 日本静冈县 430-8533)

摘要:1933年7月,曾经发生过一起东北青帮组团访问日本的事件,该事件的导演是在东北的日本人团体和关东军,正是他们策划并促成了青帮代表团访日计划的实行。面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青帮头目投日本人和关东军所好,谎称青帮为宗教团体,积极参与关东军的伪满洲国建设。这个颇有荒诞剧意味的事件说明,战前日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远不像一般所说的那么深透。如同日本学者野村浩一的反省:日本在近代的失败,就是其中国认识的失败。

关键词:伪满洲国;青帮/在家里;日本

一、引言

1933年7月,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件:东北青帮(在东北,通常被称为“在家里”,以下行文除史料用语外,按惯例统称“青帮”)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关于这次访问,据笔者所知,至今尚无一位中外学者专门论及。出版于1933年的利部一郎的《满洲国家理教》是笔者所见的唯一一部公开记录,收藏在日本东洋文库等少数几家图书馆的这本小书,虽然为我们提供了青帮代表团访日期间的具体情况,但仅凭这本书还无法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无法了解青帮访日和日本殖民统治之关系。本文在笔者以往研究的基础上,^①利用多年来收集的资料,试图对该问题作一番初步考察。

青帮代表团成员10名,随员4名,加上3名作为向导的日本人,共计17名。《满洲国家理教》一书具体记录了代表团名单:

1. 代表名单 奉天(沈阳)代表:冯谏民(21字辈,48岁)、王兆麻(21字辈,55岁)、张新甫(21字辈,44岁)、祖宪庭(22字辈,48岁)、林庆臣(23字辈,54岁)。新京(长春)代表:吕万滨(21字辈,60岁)、常玉清(22字辈,49岁)。营口代表:郝相臣(22字辈,55岁)。哈尔滨代表:赵庆禄(22字辈,63岁)。法库门代表:杨宇山(22字辈,55岁)。

2. 随行人员名单 吴泰淳(新京)、郝俊和(营口)、姜国本(关东州金州)、评世信(奉天)。

3. 向导人员名单 平野武七、鹭崎研太、吉村智正。^[1]

青帮代表团一行6月28日从沈阳出发,途经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7月1日抵达东京,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他们先后参拜了作为日本帝国象征的明治神宫、靖国神社、横须贺军港

^① 参阅拙文:《宗教結社、権力と植民地支配——“满洲国”の政治統合における宗教結社》,《日本研究》第24集,2002年。



以及庆应义塾大学。代表团访日期间有两次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一次是7月3日在东京会馆召开的由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文部省和拓务省联合主持的欢迎会。出席这次欢迎会的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等6人,陆军省次官柳川等14人,海军省次官藤田等12人,文部省次官栗屋等5人,拓务省次官河田等3人,此外还有学者、宗教家、财界人士、官僚以及伪满洲国驻日公使等,共计40人。日本著名的“支那学”创始人白鸟库吉亦在其中。白鸟是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学的创始人,堪称“支那通”,他何以会出席欢迎青帮访日团的招待会,第二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道出了个中原委。

7月4日和5日,在位于东京芝区的增上寺,连续举行了两场关于青帮的研究会。参加者除访日团一行17人外,还有参加前一天欢迎会的白鸟库吉、加藤玄智、常盘大定、小柳司气太和数名宗教家、陆军省参谋本部职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40人。^{[1]21,55}研究会在青帮代表演示其仪式后,以日方与会者和青帮代表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研讨。最后,神道学家加藤玄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家理教乃一自力宗教,别异于在理教他力宗教,寻根究底,源于禅宗自力教也。”^①

众所周知,在清代历史上,青帮通常被作为“反社会”的组织而屡遭禁止。进入民国后,青帮的社会声誉更是不佳。因此,在“满洲国”成立后一年多,青帮未能获得殖民权力的承认,从而无法作为合法组织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何以青帮能够作为“满洲国”代表出访日本,并成为日本政府的座上宾呢?日本方面又是出于何种动机来策划此次访问的呢?

二、在言说与实际之间

关于青帮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而言,青帮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来往于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中的组织。^②清代咸丰年间漕运废止后,水手间的结拜形式随着水手的移动而传到各地,天津和上海是近代青帮最为活跃的两个城市。

和内地一样,东北青帮也是按照模拟亲属关系的原理结成的,以“字”或“辈”表示成员的身份和相互关系。“前二十四辈”的最后四字为“大”、“通”、“悟”、“学”,“后二十四辈”的最初四字为“万”、“象”、“依”、“归”。不同辈份的青帮成员分别属于“兴武六”、“兴武四”、“嘉海卫”、“江淮泗”、“嘉白”、“杭三”等“帮”。这里的“帮”类似于宗族制度中的“房”。青帮有“师徒如父子,同参似手足”之说,意为既重师徒间的上下关系,也重结拜兄弟间的横向关系。青帮为了强化组织的凝聚力,制定了“十大帮规”,提倡遵守礼教的仁、义、礼、智、信,同门互助,不得欺师灭祖,不淫不盗,不泄漏内部秘密等等,对违反者将处以一定的惩罚。当然,这些规则多数时候只是形式,实际上违反帮规的人和事比比皆是,只要不涉及组织和成员的利害关系,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制度和专人来保证帮规的严格执行。^[2]原因之一是,青帮是包含各种互不统属的民间结社的方便称呼,我们从安清道友会、安清帮、在家里、清门等不同名目可以看出,青帮的各种组织虽然在结构、信仰、仪式上颇多类似,彼此之间未必存在直接关系。

近代日本人是将青帮置于“秘密结社”话语中叙述的。^③1870年代以后,明治政府积极推进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为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分别派遣“调查员”到中国,“调查员”发回日本的报告屡屡涉及“秘密结社”。报告一般采用清朝官方文书里

① 参见加藤玄智:《家裡教の宗教的判断》,收入利部一郎:《满洲国家理教》,东京:泰山房,1933年,第57页。

② 在最近出版的论著中,可参阅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酒井忠夫:《中国帮会史的研究(青帮篇)》(东京:国书刊行会,1997年)。

③ 参阅拙文:《话语之旅——关于中国叙述中秘密结社话语的考察》,《中国学术》第18辑(2004年)。

的“会匪”、“会党”、“教匪”、“教党”字样,并将这些组织统称为“秘密结社”。在“调查员”中,平山周、宗方小太郎等“一身而二任”,同时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从而有机会接触到南方的会党。受革命党人的影响,他们大都认为会党具有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能性。^[3,4]但是,也有一些“调查员”对会党持否定态度,外务省“调查员”山口升在报告中写道:“至其大部(结社),无非迷信或无赖之结合体。”^[5]西本省三也认为,秘密结社“既无主义,亦无理想,其唯一之问题为经济问题”。^[6]从这里可以看到,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对中国秘密结社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民国成立后,日本出版了很多以“秘密结社”为题的书籍。192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长野朗的《支那的社会组织》。作者认为,中国秘密结社“形态并不单纯”,“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有带有政治色彩的,有带有匪徒色彩的,还有带有工会特点的等等”。^[7]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白莲教、红枪会之类的宗教结社。他从这些结社与既有政治体制关系的角度,将其历史分为“援助朝廷时代”、“反抗朝廷时代”、“排外时代”、“自卫团体时代”;第二,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匪徒性的秘密结社”,这些结社“或有政治意图,然非其本来面目;间为野心家利用,然其本旨为劫富济贫”。^[7]应该说,关于“秘密结社”的这些议论大都只是浮光掠影的观察,并不足以反映其实际情形。

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面对如此突然的政治巨变,一些青帮头目迎合关东军,自称是信奉佛教的组织。青帮的政治姿态正中关东军的下怀,关东军为了将青帮纳入殖民政治秩序里,十分关注青帮的动向。11月10日,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为中心的东北日本人团体,在奉天(沈阳)成立了“自治指导部”,该组织的理论纲领为《满蒙自由国设立案大纲》,其中对宗教结社和“秘密结社”作了如下评论:“支那(原文如此,以下同——引者)因社会存在缺陷而衍生出肿块,如青帮、红卍字会、大刀会等结社即是。误以为此类(结社)均为自治机关,业已带来种种弊端,此乃日本人易陷之谬见也。盖此类结社决非真正之自治机关,古已有之者,保甲制度与清乡制度也。”^[8]值得注意的是,该纲领否定了青帮、红卍字会、大刀会等结社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保甲制度的社会意义。于汉冲在上任“自治指导部”部长之前,曾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至打破旧有陋习,亦应持渐进主义”^{[9]160},认为应该慎重对待民间结社问题。

担任“自治指导部”顾问的橘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东北社会的特质是大部分属于封建的农村社会,在此应该适用的自治原则是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宗族制度、土地庙制度等血缘、地缘团体,而在城市,应该按照同业工会及其它宗教团体的实态,完全保障人民的生活。^{[9]162}橘朴曾被鲁迅称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他在论述东北社会时只字不提青帮,显然视青帮为中国社会周边性之存在。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问题是应该怎么做才能巧妙地改变其反社会之性质,并且使其成为支持统治、对抗农村与城市中之左翼势力,为此需要重新组织和训练之”^[10],对青帮的利用需建立在改造的基础上。

那么,东北青帮是何时出现的?又是怎样一种组织呢?我们没有青帮方面留下的记载,只能借助日方的观察来简单予以追溯。关于青帮,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参谋部调查资料里有如下节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左右,海上有汽船航行,陆地有列车疾驶。青帮势力侵入支那沿岸各港口,进而沿铁道侵入内地。在满洲东面,从安东沿鸭绿江水上行,深入山林地带;在西面,从营口沿辽河而行,深入其流域;另外,从大连沿铁道至哈尔滨,再从那里沿

松花江和北满铁道,深入西伯利亚、沿海各州。……其势力现已到无法消灭之地步。^[11]

此外,协和会编辑的《在家里调查报告书》对东北青帮历史有如下记载: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于公田(杭三,悟字辈)在安东招收弟子,扩大青帮组织。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吴鹏举(兴武四,大字辈)在大连活动。1920年(民国九年)以后,华北青帮大字辈著名人物王连三(兴武六)、党金源(杭三)、厉大森(嘉海卫)、王约瑟(嘉白)、曹幼珊(江淮四)等纷纷在东北各地开设香堂,广招弟子。^①“满洲国国务院”的一份稍早的资料证明协和会的上述记述所言不虚:“满洲家里系统复杂:既有从京津地方传来的,也有随山东移民而来的,还有伴随南方娼妓业传入的,其会员几乎遍布所有阶级,具有相当之潜在势力。”^[12]以上资料都涉及东北移民与青帮之关系。17世纪满人人主中原后,为了防止满族发祥地的“汉化”,颁布“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迁徙关外。但是,由于东北需要大量劳动力,实际上,从华北移居而来的汉人源源不断,人口不断增长。^[13]进入民国后,汉人人口业已占全东北总人口的九成。^[14]

伴随汉人的移入,青帮等民间结社也在东北落地生根。东北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华北地区(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等),其时,“山东省每年人口增加约四十五万,其中三分之二被迫前往他省打工。此外,直隶省的情况不甚了了。每年从他省移居满蒙的劳动者总数约为四十至四十五万人,其中留在东北的有七成以上,约为三十万人左右。”^[15]1927年11月,沈阳日本领事馆报告称:“近来自山东、直隶方面移入者明显增加,不单数目在增,选择永住的益众。”^[8]直到“九一八”事变,内地前往东北的移民才始告中止。^②

对东北青帮的情况颇为熟悉的末光高峰(义)认为,“闻目下满洲之家里近百万人,仅大连一地即有二十三万人,正确数字无从知矣。”^[16]青帮在东北南部的大连、营口、安东等港湾地带活动最盛,“不人在家里,则一无可为。至安东满洲人,九成自称在家里”。^{[16][17]6}“北满洲之哈尔滨,在家里较奉天、新京更盛。在家里遍及东支铁路线上之满洲人、巡警、警备军人、以松花江为中心的航运工人、以及其它所有阶级中,实际上,其数目为几何、渗透于何处,其详情不得而知。”^{[16][17]5}可见,以东北交通沿线和城市为中心,随着移民社会的形成,青帮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东北青帮按照怎样的原理组合,其内部具有怎样的特点?对此,末光作了如下分析:

现下,在家里之精神依阶级而不同,完全没有统一。不仅如此,组织上均按地域划分,各有若干师傅与徒弟,即便彼此互相勾结,二者之间亦无特别联系。尤有甚者,师傅住上海、天津、满洲,而徒弟辈在新京、奉天、大连,抑或他地,或师傅所在地。(中略)现住北平之王约瑟,乃张作霖生前之私人顾问,在奉天拥有极大之势力,属第二十辈,为满洲在家里最高辈份。其徒弟有杨宇霆、张宗昌、冯谏民。然若谓今日满洲第二十一辈皆为王约瑟儿子辈,未必尽然。青帮之中尚有上海系统、青岛系统与天津系统之分,人们甚至连其系统亦无法弄清。^[18]

① 协和会中央本部调查部:《在家里调查报告书》,原文为日文,这里引用的是1947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松江第六大队”的意译。从行文可知,报告书作于1941-1943年4月1日(伪满治安部废止)。

② 关于东北移民出生地,1929年的统计如下:山东省742 000人,河北省172 000人,河南省117 000人,其他16 000人。(参见:《满洲に於ける出稼移民》,《東亜同文書院第24回支那調査報告書(昭和五年度第27期)》第二卷,愛知大學圖書館藏)

这里,末光鉴于“满洲国”成立初期,各地青帮竞相迎合伪满政权而出现的混乱局面,批判部分青帮,强调应该对青帮进行整合。末光提到东北青帮的系统,指出大部分都来自天津、山东和上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末光提到的王约瑟是山东省铎县人,在北京、天津一带拥有众多弟子^[19],在东北也有很多徒子徒孙。1934年,王约瑟访问吉林省,以从事佛教活动为幌子,试图加强关外与关内青帮联系,因而被国民政府视为日本特务。^[20]确实,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王约瑟的青帮网络协助了日军对华北的统治。^①在天津系统的青帮中,自称“满洲国在家里总代表”的冯谏民(亦名冯竞欧)曾在张作霖部队任陆军少将。末光没有具体提到上海系统的青帮人物是谁,前述协和会资料中出现的曹幼珊系山东省出身,长期客居沪上,是上海著名的青帮人物。曹幼珊在1934年1月初曾秘密访问东北,和长春、沈阳、哈尔滨的青帮头目会面,“在每次集会上,他都详细地介绍家里教的由来及其与青帮之关系,宣讲教理与仪式的精髓,强调南支(中国南部——引者)青帮与满洲国在家里应互通声气、团结一致、弘扬义气”。^[21]曹在两地青帮中颇有影响,试图沟通二者,其背后可能暗藏着某种政治意图。这从曹幼珊弟子常玉清可以窥见一斑。

常玉清是活跃于大连的青帮人物,出生于江苏北部,据说是满族旗人,属于通字辈,曾为上海日本棉工厂的“工头”。1932年5月,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常玉清与胡立夫在闸北组织亲日的市民维持会,为此,胡被国民党驻上海特工人员暗杀。常见状不敢滞留上海,远遁大连。^[22]在大连,常玉清一住就是五年多,师傅曹幼珊的青帮关系帮助了他。常于1937年12月返回上海,其在大连的一段历史鲜为人知。^②作为青帮访日团一员,常玉清曾在日本人面前不无得意地回忆起自己在上海的经历:“上海事变之时,鄙人为日军拼命工作,为此,同志一人被暗杀,鄙人则死里逃生,幸免于难。”^{[1]46}至于末光提到的青岛系统的青帮,目前尚缺乏验证资料。一般说来,在东北,山东出身的青帮人数众多,其中杂有青岛系青帮应是不难推想之事。

以上,本文考察了末光所言及的东北青帮的情况,末光的观察固然很重要,但还不能说它反映了整个东北青帮的实际情况。例如,齐齐哈尔青帮的头目刘少恩和丁贵升是“通字辈”,属于“兴武六帮”,分别经营剧场和妓院。日方的调查称:“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引者)前,刘少恩与丁贵升二人从上海请来师傅窦长清,接受其指导。窦于昭和六年(1931年——引者)十二月回江苏省扬州探亲后不知所向。”^[23]

青帮在东北的影响力主要在城市,成员来自各个阶层,头目大多为退伍军人、失意政客、流氓头子、商人等,一般成员多为商贩、工人、军警。据末光调查,大连“东亚佛教会”成立时,会长柳成名(大连马车工会会长)、副会长刘神致(从事鸦片贩卖)、邢顺亭(经营房屋出租)、尹天纯(福昌华工公司苦力头目)、王宝春(人力车收容所头目、经营饮食业)等主要成员皆从商。虽然青帮头目在当地可称头面人物,政界出身者亦不在少数,但是从未作为社会团体得到东北军阀政权的承认。

三、东北殖民统治与青帮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日本人组织颇为活跃。“满洲青年同盟”、“大雄峰会”和以橘朴为主笔的《满蒙评论》杂志应关东军的要求,积极为日本占领东北寻找意识形态根据。一位

① 另一说称,王约瑟为天主教徒,在华北有青帮弟子五千名。(《北平青帮调查资料》,华北区政治部,1949年5月)

② 常玉清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返回上海,与日本浪人组织“黄道会”,暗杀抗日中国人。1938年,复在南京设立“安清同盟会”。1946年5月,常以汉奸罪被处死。起诉书没有言及其在东北活动。(参见上海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页)

日本学者指出：“他们的积极参加成为建国的巨大推动力，在此，他们编织出善政主义、民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亚洲复兴、人类解放等各色梦想，将其作为满洲国的建国理念提了出来”。^[24]

1933年3月，在沈阳成立了以酒井荣藏为首的“大满洲国正义团”。^{[21]227}酒井野心勃勃，试图借助青帮关系网向东北各地发展、扩大组织，一时间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后来，在伪满“基于一国一党主义，统一教化团体的旨趣”下，“大满洲国正义团”被“满洲国协和会”兼并吸收。^{[21]227-228[25]545-548}“大满洲国正义团”呼吁各地青帮响应其号召，同沈阳青帮代表祖宪庭、长春代表吕万滨以及“全满总代表”冯谏民等青帮建立了“合作关系”。时人泷泽俊亮在《满洲的街村信仰》中指出：“大同二年（1933年——引者），为了满洲国正义团整合全满同志之需要，冯谏民从奉天出发，奔走于各地主要都市，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新加入的会员为数不少。”^[26]在“大满洲国正义团”成立大会上，冯谏民的祝辞道出了青帮与“大满洲国正义团”之间的密切关系：“今日入门之日本人、满洲人，齐聚一堂，谨守家里之道。吾等家里崇尚师徒如父子、同参若手足。古语曰：远亲不如近邻。吾等黄种同胞，本如手足，有若满人同参因缘之深者乎。”^[27]所谓“合作关系”，其实是“大满洲国正义团”利用青帮的幌子，而“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加入青帮，不过是加强吸收青帮的手段而已。正是出于这种一体关系，数月之后，“大满洲国正义团”游说关东军，青帮访日团的一幕才得以上演。日方资料记载道：

日本方面，鹭野研太（应为“鹭崎研太”——引者，下同）、平野武七郎（应为“平野武七”）、官地（久卫）大佐等游说陆军省和关东军，声称标榜彻底的皇室中心主义，在获得满洲政府承认之后，将全满在家里教徒二百五十万人结为一团，与大日本正义（团）连为一体，提倡大同团结，组织清静兴民同志会，颁布主义纲领，抛弃以往之秘密活动，以公认结社现身社会。^{[21]228}

鹭崎研太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职于伪满洲国治安警察部门。平野武七系大陆浪人，青帮会员。官地久卫从骑兵第一连队长退伍后，担任过“东京社会事业协会融和部长”、“中央融和事业协会理事”等职，“专门从事特殊部落民的融合事业”，“去岁，受军部方面委托，调查我国特殊部落民能否向满洲移民之问题。岁末渡满期间，知满洲支那人中有类似宗教结社。特殊民移居满洲后，是否遭致土著民歧视，此番为探求土著民之态度，利用再次渡满之机，调查在家里”。^[28]可见，官地为了了解青帮组织而结识了鹭崎和平野，而后二人通过官地游说关东军，终于得到伪满洲国政府许可，结成了“清静兴民同志会”之青帮组织。

除“大满洲国正义团”之外，日本大本教也积极向青帮靠近。大本教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新兴宗教之一，由出口すみ子创设。后来，王仁三郎入赘出口家，成为“教祖”。出口王仁三郎任教祖后，一改大本教保守复古的姿态，提出参与时政、改造社会的主张，为此以“不敬罪”遭到政府的弹压。关于大本教与青帮之关系，泷泽俊亮称：“尤为重要者，大本教人类爱善会与家里教均以天之御中主神为始祖，颇动众心，入门者一时骤增。”^[26]在青帮代表团访日之际，“其代表及随员中，滨江警务司令部咨议鲁宾化及律师张庆禄特地访问绫部（大本教）之本部”。^[26]需要指出的是，泷泽虽为当时人，但他书中所列举的鲁宾化和张庆禄之名并不见诸青帮代表团成员名单。张庆禄的“张”和赵庆禄之“赵”日语读音相同，疑为笔误。鲁宾化其人不知，可能是吕万滨之讹，因为“鲁”与“吕”在日语中发音相同。青帮代表团即将访日时，末光在一篇文章中称：“冯谏民一行入哈尔滨，当地在家里代表闻冯谏民欲去日本，要求哈尔滨代表亦能加入同行，后定冯师直系滨江警备司令部咨议鲁宾氏与他系律师庆禄等二名渡

日。”^{[16][17]}这里的鲁宾和庆禄,即前述之鲁宾化与张庆禄。

关于青帮代表对大本教本部的访问,现有的公开出版物皆语焉不详。1999年6月,笔者在京都府龟冈市天恩乡大本教资料馆发现了6张照片,从中可知青帮访日团中有5人于7月11日晨访问了绫部的大本教亚洲本部,13日访问龟冈。6张照片中有1张是大本教教主出口すみ子和教祖出口王仁三郎与5位“满洲人”的合影。从照片的旁注文字看,5人同时拥有在理会(教)与青帮的二重身份。利部一郎《满洲国家理教》书中附有青帮访日团一行的集体合影,比照两张照片,可知5人分别是祖宪庭、林庆臣、吕万滨、常玉清、赵庆禄。此外,笔者在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还查阅到了地方警察暗地跟踪青帮访日团的如下记录:祖宪庭、王兆麻、常玉清、吕万滨、林庆臣、赵庆禄等6名及随员8名,一行共14人于13日至16日访问了大本教的本部龟冈和绫部。^[29]

人们也许会奇怪,青帮何以会与大本教有瓜葛?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此事要追溯到出口王仁三郎的蒙古之行。1923年,还在“保释”中的出口王仁三郎接触到为慰问“关东大地震”而访日的红卍字会而对中国发生兴趣,试图在中国“满蒙”建立大本教的宗教王国,其后,他与曾经参与孙中山革命的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者相互利用。^[30]出口王仁三郎在其第一次访问中国东北时,通过大本教信徒和沈阳的青帮发生了联系。出口王仁三郎的孙子出口京太郎撰写的《巨人出口王仁三郎》称,1924年2月中旬,出口王仁三郎“夜至奉天,投宿悦来栈,与祖宪延会”。^[31]这里的“祖宪延”系“祖宪庭”之误。正是在这一关系的延长线上,1932年1月大本教与“含有禅、儒之安清会”建立起了合作关系。^[32]因此,青帮访日团在7月7日夜晚受到在东京的大本教外围团体“人类爱善会”的招待,也就不足为怪了。^{[1]16}

从上可见,日本“大满洲国正义团”与大本教等组织试图利用青帮网络建立其在东北的势力。同样,一些青帮组织也积极地与这些日本方面的组织相勾结,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后,双方关系更加密切。为此,青帮代表团访日的一幕才得以上演。

四、青帮访日团始末

那么,青帮代表团访日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实现的呢?连“合法”资格都不具备的青帮何以能在日本受到俨如“满洲国”代表团一般的接待呢?无疑,后面少不了前面提到的东北日本人团体的推波助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积极推进占领东北计划的同时,开始考虑如何将中国社会整合在其殖民统治的秩序之中。“满洲国”意识形态“五族协和”积极鼓吹者橘朴对青帮的看法与上述东北日本人团体略有不同。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愿向当局建议,正如上海共同租界所实行的对策一样,通过保护和改革青帮组织,既可为(制定)控制劳动者政策奠定基础,又有助于制定对付盗匪(包括流氓)之对策。”^[33]与橘朴的意见相反,末光虽然承认青帮具有反社会、反体制的性格,却高度评价1933年后在伪满洲国统治下青帮所能发挥的作用,认为可“将在家里改组为政党”,他在文章中写道:

尤为要者,在家里非仅存于满洲之秘密结社,乃遍布于支那全国之民族性结社也。迄今为止,在家里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常展示其巨大之潜在力量。基于其以往之历史,对行王道政治之满洲国而言,诚为最重大之问题。以王道政治驯化在家里,不仅合乎王道政治,大言之,亦可统一支那全国大众。^[34]

末光发表在《满蒙评论》上的其他文章也高度评价了青帮的作用：“此一秘密结社青帮在家里，于满洲突然公开声明其社会作用，至其组成统一、合法之结社并开始活动，应密切监视其动向，正确理解其精神，实施相应对策，对新兴满洲国而言，此事实为最重要之问题。”^[16]末光的认识与正在摸索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关东军指导部的想法完全一致，关东厅警务局长对于青帮访日的意义作了如下评论：“在家里乃支那以宗教信仰结合之秘密结社，有严格戒律约束帮员，于提升个人之余，帮员共存互助，各阶级中皆有众多帮员，为社会上一大潜在势力。军部及其它与满洲有关人等，多有利用家里维持满洲国内治安、普及满洲建国精神者。本于此，此番促成满洲在家里代表访日、考察日本各处、与在家里研究者会面，藉此使若辈知日本援助满洲国之所在，期以将来日满提携。”^[35]显然，日方组织青帮访日团旨在促进“日满提携”。其具体政策为：第一，利用青帮作为宣传机关，纠合东北各地的青帮成立联合总会，指导教化帮员。第二，将青帮作为民众的自治互助组织，整合劳动者，使其成为地方保甲中坚，从事社会改良，揭发“反满分子”，进而展开对“支那本土”的工作。^[35]

但是，在青帮访日团出发前，日本驻牛庄领事荒川充雄在致“全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的信中写道：

此次，在军部怂恿之下，派遣七名全满各地家里教代表去内地（指日本——引者）考察。其中哈尔滨二名（胜、张）、新京一名（卢）、奉天三名（冯、王、常）、营口一名（郝）。该代表等特来营口，向营口约二万同志报告此事，名单见附件。该代表人等携海军司令官小林之介绍信访问宪兵分队，希冀得助。同夜八时许，于营口硝矿局楞严寺（付属地外）集合同志百余名，报告此事，要求得到赞同。本月四日，该代表等于新京集合，领取军部所发包括旅费在内之所有盘缠，称准备正式渡日。军部利用此等教徒旨在使全满二百万该教徒独立，以便与南方之家里对抗。^[36]

荒川对军部利用青帮一事提出了间接批评。他继续写道：“郝相臣原系总商会会长，又为红卍字会首脑，在营口颇有势力。以往回营口时，实业家之来访频繁，此次该代表以家里教代表回营，商民闻知，皆敬而远之，无一人来访。”^[36]但是，荒川人微言轻，他的意见没有被接纳。

当青帮一行访问日本十天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7月11日，青帮访日团被勒令解散，一行分作几批先后返回了东北。何以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场后，竟如此匆匆收场？其中缘由，关东厅警务局长事后的说明透露出了一点信息：“其间，一行之吉井清春藉机行沽名钓誉之事，而鹭崎、平野等暗自挪用关东军支付之经费约一千五百元事发。十一日，突然命令一行解散。吉井除名，一行不得于东京自由行动。”^[37]仅从这段文字来看，青帮访日团的解散似乎事出偶然。但从下面一段引文中不难发现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据陆海军方面消息，该方面决定不承认在里（指青帮——引者），意欲弹压之，真相不明也。虽然，彼仍以宗教之力结成团体、继续活动。”^[37]日本陆军和海军方面显然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消息，发现关东军极力推荐、并视为“满洲国”社会基础的宗教团体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秘密结社”——青帮，于是，借口几个给代表团作向导的日本个人行为不检点而下令解散代表团。一个星期前陆海军要人还出席了隆重招待青帮访日团的欢迎会，何以几天后即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谁促使陆海军改变对青帮政策的呢？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前引关东厅警务局长事后说道：“此番渡日，未能按计划结束，观部分国人不良分子利用（青帮）情状，将来必遗祸根，思之，诚可忧也。”这一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他并未意识到关东军带给日本政府的“尴尬”决非“部分国人不良分子”所致，而是和日本近代面临的国家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的。^[38]

五、结语

以上,本文以鲜为人知的东北青帮代表团访日为切入点,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爬梳,勾勒了日本殖民者与青帮关系的一个侧面。可以看到,青帮代表团访问日本这出闹剧的上演决非偶然,而是导演和演员默契配合的结果。

这出闹剧的导演无疑是在东北的日本人团体和关东军。在军事占领东北后,关东军急欲为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寻找社会支持。于是,在一些日本人团体的鼓动下,青帮成为日方利用的资源。自清末以来,日本对青帮不乏深入了解,但是,这些看法根本没有反映在关东军指导部的政策里,相反,由于有末光高义这样的“秘密结社”专家的鼓吹,^①关东军误认为青帮是东北最大佛教团体。为了将青帮改造成为效忠帝国的团体,关东军出资让青帮组团访问日本,使之成为帝国政府的座上客,从而闹出了一个政治笑话。

演员们的表演也可谓“出色”。针对导演的嗜好,一些青帮头目竞相投日方所爱,谎称宗教信徒,隐瞒青帮真相。其实,如果没有与在东北的日本人团体的一唱一和,在东北军阀政治下处于边缘地位的绝大多数青帮头目是无法接近政治的,因为且不说民间社会对青帮敬而远之者甚多,就是在“满洲国”政府内部,大大小小效忠于日本帝国的中国人对青帮亦甚为反感。但是,这些仰人鼻息的中国人决不会冒着得罪受到日方垂青的青帮的危险而道出事实真相,因此,青帮演员表演得固然精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沉默,这台戏也是唱不起来的。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描述的增上寺里发生的那一幕。增上寺历史悠久,是日本净土宗的总部。在这里摆设青帮的香堂,此事不同一般。日本著名的“支那通”白鸟库吉连续两日出席香堂大会,更是不同寻常。他亲临现场观看香堂的仪式,与青帮代表面对面地接触,不会没有关于青帮的言论。那么,其内容是什么呢?也许,它与增上寺青帮香堂上的香烟一道,早已散尽在历史的沉默中了。

参考文献:

- [1] 利部一郎. 满洲国家理教. 东京:泰山房,1933.
- [2] 潘居士,李格政. 沈阳清帮家理和清理. 沈阳文史资料,1986(9).
- [3] 平山周. 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 日本及日本人,1911(569).
- [4] 神谷正男. 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秘録:上. 东京:原书房,1975:187.
- [5] 山口昇. 清国情勢及秘密结社(明治四十三年十月). 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藏:各国内政關係雜集·支那之部·革命党關係·革命党ノ動静探查員派遣.
- [6] 西本省三. 江蘇安徽兩地方會匪視察報告. 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藏:各国内政關係雜集·支那之部·革命党關係·革命党ノ動静探查員派遣.
- [7] 長野朗. 支那の社会組織. 东京:行地社出版部,1926:53.
- [8] 小林英夫,島田俊彦. 現代史資料7·滿州事變. 东京:みすず書房,1964:252.
- [9] 滿州国史編纂刊行會編. 滿州国史·各論.(出版社不詳),1971:160.
- [10] 橘樸. 土匪とギャング. 滿蒙評論,1932,2(19).
- [11] 黑龍江省内ノ家裡ニ就テ(第十四師團參謀部調),昭和九年一月十五日. 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藏:各国内政關係雜集·在家裡關係.
- [12] 滿州国国务院總務庁情報処. 省政彙覽:第一輯,吉林省篇.“康德”二年:217-218.

① 末光高义著有《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大连:满洲评论社,1932年)一书。

- [13] 路遇. 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14] 満州国史編纂刊行会. 満州国史・総論. (出版社不详), 1970: 73.
- [15] 小峰和夫. 満州——起源・殖民・覇権. 東京: お茶の水書房, 1991: 154.
- [16] 末光高峰(義). 青幫の在家裡が満州に政治的活動を始めた. 満蒙評論, 1933, 5(1).
- [17] 末光高峰(義). 満州の秘密結社と政治的動向. 大連: 満洲評論社, 1933: 6.
- [18] 末光高峰(義). 在家裡の動きと東亜仏教会の全貌. 満蒙評論, 1933, 5(15).
- [19] 北平青幫概況. 华北区政治部, 1949.
- [20] 森岡正平. 華北ヨリ入吉セル在家裡教徒ノ行動ニ関スル件. 昭和九年八月一日.
- [21] 満州及支那に於ける地下秘密団体に就いて. (编者、出版社不详), 1936: 223.
- [22] 工部局捕房刑事股副探長致警務所報告(1938年11月). 档案与历史, 1989(2).
- [23] 内田五郎. 齊齊哈爾ノ青幫概況ニ関スル件. 昭和八年五月十三日.
- [24] 山室信一. キメラ—満州国の肖像. 東京: 中公新書, 1993: 91.
- [25] 乔越. 昙花一現的偽満州正義団//孙邦. 殖民政権. 長春: 吉林省人民出版社, 1993.
- [26] 滝沢俊亮. 満州の街村信仰. 大連: 満州事情案内所, 1940: 291.
- [27] 馮諫民. 馮諫民師の慈悲//在家裡研究資料. 東洋文庫藏, 油印本, 約 1933.
- [28] 藤沼庄平. 在家裡真相調査員ノ身元其他ニ関スル件. 昭和八年五月十六日.
- [29] 齊藤宗宜. 満洲在家裡在理両団体代表來往之件. 昭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 [30] 孙江. 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
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31] 出口京太郎. 巨人出口王仁三郎. 東京: 講談社, 1973: 197.
- [32] 大本七十年史編纂会. 大本七十年史: 下卷. 京都: 大本七十年史編纂会, (年代不详): 99.
- [33] 橘樸. 青幫を如何に扱ふべきか. 満蒙評論, 1933, 5(3).
- [34] 末光高峰(義). 秘密結社の指導原理. 満蒙評論, 1933, 5(5).
- [35] 関東庁警務局長. 在家裡代表団ノ渡日, 昭和八年六月十三日.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36] 荒川充雄. 全満青幫代表渡日視察ニ関スル件, 昭和八年六月三日.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37] 関東庁警務局長. 渡日在家裡教徒ノ歸來言動, 昭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38] 孙江. 宗教結社、権力と植民地支配——“満洲国”の政治統合における宗教結社. 日本研究, 第 24
集, 2002.

Green Gangs' Meetings in Zōjōji Temple

SUN J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Green Gangs in the course of Manchurian colonization. The first part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focusing specially on the origin and organization of "在家里" (zaijiali or zaikari) — Green Gangs.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role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political integration after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final part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Green Gangs' visit to Japan.

Key words: "Manchukuo"; Green Gangs; Japan

(责任编辑 朱剑)